

大藏经札记二则

李际宁

一、“崇宁万岁寺”、“崇宁万寿寺”辨

宋人梁克家的著作《三山志》是一部记载福州地区地理、人文的重要文献。笔者注意这部书，是因为它记载了福州东禅寺等觉禅院的历史及该寺雕印《崇宁藏》的一些情况。其实，凡研究《崇宁藏》者，可以说，必然要用到这部资料。然而，《三山志》在记载东禅寺于崇宁年间改寺名一事，却与其他资料有悖，孰是孰非，有必要做点辨证工作。

《三山志》卷三十三记载：

东禅院，易俗里。五年，州人郑昭勇捐宅为之，在白马山上，旧名净土。唐武宗废为白马庙。咸通十年，郡人迎僧惠筏居之，及夜禅定，有戎服若拜而辞者，是夕或见白驹东之。观察使李景温因撤祠为寺，号东禅净土。钱氏号东禅应圣。皇朝大中祥符八年，赐号东禅等觉。崇宁二年，因进藏经，加号崇宁万岁。绍兴十年，改崇宁万岁为报恩广孝。十七年，改广为光。……有大藏经版，侍郎陈赐劝造。

按照梁克家的记载，崇宁二年，东禅寺因大藏经刊成，上奏朝廷，得赐大藏经名《崇宁万岁大藏》，寺院亦得敕赐，加封寺名曰“崇宁万岁寺”。

以“崇宁万岁”为寺院名称者极为少见。通常，文献资料凡涉及此一寺名的时候，几乎全无例外地记录为“崇宁万寿寺”。这样的记载，史料中不胜枚举。宋徽宗继位，定年号建中靖国。第二年（壬午 1102）便改元崇宁，随后诏赐全国建立以“崇宁”为名的寺庙。《释氏稽古略》徽宗壬午年下记：“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。”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九壬午年条记载：“改年崇宁（铸崇宁当三钱。诏天下军州创崇宁寺。又改天宁，替先号）。”不仅佛教寺院如此改名，当时道观也敕令统一改名。比如，《咸淳临安志》卷七十四记载：“崇宁二年改崇宁万寿观。”这是当时的一项法令，颁赐的寺院道观名称是不能随意改动的。

高宗绍兴九年，定都临安。《释氏稽古略》记载，为给徽钦二宗祈福，下诏诸郡县州，改崇宁万寿寺（或天宁寺）为报恩光孝禅寺，以奉徽宗皇帝香火也。当时，改天下崇宁万寿寺（或天宁寺）为报恩光孝禅寺以为被金人北掳的徽宗、钦宗两代皇帝祈福是南渡初的一件大事，福州东禅寺亦不例外。包括《三山志》在内的许多史料记载，绍兴十年，诏改福州东禅寺名为报恩广孝禅寺，十七年再改报恩光孝禅寺。

其实，福建东禅寺在崇宁年间到底改为何名，还有一件重要资料可以为证，就是北宋颁赐《崇宁藏》的敕文。这篇敕文刊在《崇宁藏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卷一之首：

敕赐福州东禅等觉禅寺天宁万寿大藏

賜窃见 朝廷近降指挥

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

候了日赐经一藏有以见

圣朝绍隆佛乘祝诞

睿算实

宗庙无疆之福然^暘契勘大藏经唯

都下有板尝患遐方圣教鲜得流通于是亲

为都大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慧荣冲真

智华智贤普明等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

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宁二年冬方始成就^暘欲乞

敕赐东禅经藏崇宁万寿大藏为名祝延

圣寿取 钧旨

十一月日奉议郎守尚书礼部员外郎充讲义司参详官陈^暘札子

十一月二十日进呈三省同奉

圣旨依所乞已降

敕命讫二十二日午时付礼部施行仍关合属去处

尚书省牒福州崇宁万寿大藏

礼部员外郎陈^暘白札子窃见

朝廷近降指挥

天宁节天下州军各许建寺以崇宁为额仍候了

日赐经一藏契勘大藏经唯

都下有板于是亲为劝首于福州东禅院劝请僧

募众缘雕造大藏经板及建立藏院一所欲乞

敕赐东禅经藏以崇宁万寿大藏为名候指挥

牒奉

敕宜赐崇宁万寿大藏为名 牒至准

敕故牒

崇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牒。

司空兼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上柱国南阳郡嘉国公蔡京；

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上柱国南阳郡开国公蔡卞；

特进行门下侍郎上柱国长乐郡开国公许将；

右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上柱国天水郡开国侯赵挺之；

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丞上柱国武昌郡开国侯吴居厚；

右光禄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清车都尉寿阳县开国伯安^惇；

朝散大夫试礼部尚书兼修国史实录修撰徐铎。

这件敕文，记录了礼部侍郎、东禅寺大藏经都劝首陈暘上奏朝廷的奏章，以及朝廷批准的敕文。陈暘，《宋史·儒林传》（卷四百三十二）载：“陈暘，字晋之，福州人。中绍圣制科，授顺昌军节度推官。……得太学博士，秘书省正字，……进鸿胪太常少卿，礼部侍郎。”陈暘因大藏经版刊成，故请赐大藏经名《崇宁万寿大藏》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，福州东禅寺

等觉院因大藏名而改名“崇宁万寿寺”。

当年刊入《崇宁藏》的敕文，随大藏一起雕版印刷流通，成为重要的历史文献，虽然没有被传统文献记载，却幸赖《崇宁藏》中得以保存。这件敕文在日本还有多件，仅据笔者所见，就有宫内厅书陵部、横滨金泽文库、京都东寺三个单位收藏。

由此看来，崇宁年间福州东禅寺敕改后的名称，应该叫“崇宁万寿寺”，上述梁克家在《三山志》中的记载有误。

梁克家有关《崇宁藏》的误记其实不止这一处。本文前引关于东禅寺和《崇宁藏》的文字中，最后说寺内“有大藏经版，侍郎陈赐劝造”一句，就给研究者带来许多麻烦。《三山志》说是“陈赐”劝造，可是有关《崇宁藏》的卷首刊记却记载以“陈暘”为劝首。到底是“侍郎陈赐”还是“侍郎陈暘”，一字之误，谬之千里。从上述史传和崇宁藏的敕文证明，崇宁藏的劝首应该是“侍郎陈暘”，而不是“侍郎陈赐”。

看来，不论多么重要的史料，使用时都要做些辨证，考察一下，用起来才放心。

二、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与《磧砂藏》

全世界已知比较完整的《磧砂藏》只有五部：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原北京柏林寺藏品、陕西省图书馆藏原西安市开元寺和卧龙寺藏品、山西省崇善寺藏品、美国普林斯敦大学哥斯德东方书库藏原北京大悲寺藏品、日本杏雨书屋藏原对马宗氏藏品。其余零种零册，不计其数。

《磧砂藏》开雕于南宋嘉定九年（1216），全部正式完工，已在元大德十年（1306）以后。明代初年《磧砂藏》曾经大规模补板，并大量印刷流传。根据当代学术史资料显示，目前存世的《磧砂藏》，绝大部分都是明初补刊本，其显著特点，就是卷首扉画及其左右两下角分别刊雕的题记“杭州众安桥杨家印行”及刻工“杨德春”，还有卷尾的牌记：“杭州在城大街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”。

“众安桥”作为地名，在《乾道临安志》和《咸淳临安志》上已有记载，桥跨清湖河上。《中国版刻图录》谓众安桥为宋代杭州文化发达地区。

历来古籍版本研究中，专论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的极少，据笔者所知，只有少数研究者提到，如张秀民等先生。事实上，众安桥杨家经坊的记载，大约在元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，元明两朝间刻印装帧书籍、特别是佛教典籍中，众安桥杨家经坊有过重要作用，其中特别是与《磧砂藏》的关系更为密切。

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明代刻书一章，列有杭州可考书坊二十四家，其中有“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”一条。张先生概述杨家经坊刻书时说：“杨家经坊刻《天竺灵签》（约洪武十八年）、《金刚经》，至成化十一年仍刻佛经。”张先生所说的这三种书都收藏在国家图书馆（原北京图书馆）善本部。另外，笔者在日本还曾见到一件。几年前，在整理馆藏柏林寺本《磧砂藏》的时候，又发现一本残册。这样，有关杭州众安桥杨家经坊不多的几条资料，在排列比较之后，或许可以有助于分析杨家经坊发展变迁的轨迹。

杨家经坊的作品，就已经公布的资料看，最早者似乎当属收藏在日本京都南禅寺的一件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。这件不论从纸质、还是字体判断，都是元代刻经的风格，卷首扉画的左下边刊“见杭州众安桥北经坊杨六郎印行”一句。这是杨家经坊在元代已经有活动的记录。

在元代中期以后至明代前期，承担印刷并装帧《碛砂藏》，使杨家经坊的活动达到了顶峰。其时杨家经坊掌握着一批著名的画工刻工，如画工陈升，刻工陈宁、袁玉、孙祐。这些工匠的作品——碛砂藏扉画，成为元代版画艺术风格的代表。而工匠陈宁的刻书活动，1988年《世界宗教研究》第1期刊登了宗教研究所张新鹰的文章《陈宁其人及回鹘文〈八阳经〉版刻地——读冯家昇先生一篇旧作赘言》，他利用陈宁曾经刊雕过的《至大博古图》和《元官藏》的资料，推测他的生活时代当在元武宗（1308—1311）至元惠宗至元二年（1336）前后。陈宁的背景，使笔者颇怀疑杨家经坊亦有相当官方色彩。

至晚到元代末年，在《碛砂藏》中有了署名“杭州众安桥杨家印行”扉画，这幅扉画的刻工是“杨德春”。他所做扉画，较之其他几幅作品，粗糙了许多。入明以后，《碛砂藏》大规模补版，这个时期杨家经坊又出现了一位新的刻工，他的名字，笔者仅在国图收藏的柏林寺本《碛砂藏》中见到过，叫“杨信真”，他雕刻的扉画完全仿照“杨德春”的作品，但却刀法生硬，人物形象缺乏生动感，刻板线条涩滞。这个时期，补雕的《碛砂藏》的字体，也不象原版那样字型略成竖长、清秀有力，而较扁平、柔软。

《碛砂藏》在明代前期以后就少有请印了。

在《碛砂藏》以外，杨家经坊还刻过一批单行本佛经：

1、《天竺灵签》一卷，经折装，上图下文，框高17.8厘米，半叶宽7.8厘米。郑振铎先生原藏。卷后有牌记，题“洪武乙口岁在仲冬吉日刊/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”。原题记“乙”后一字残去，张秀民先生推测应为“乙丑”，即洪武十八年（1385），张先生注其版本为：“约洪武十八年”。

2、《金刚经》一卷，经折装，上图下文，框高23.3厘米，半叶宽11厘米。郑振铎先生原藏书。卷后莲花牌记内刊：“杭州众安桥北杨家经坊印行。”《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着录为“明初杨家经坊刻递修本”，当是可信的。

3、张秀民先生在述及杨家经坊刻书时说：“至成化十一年仍刻佛经”，此一句当指馆藏《梵网经菩萨戒、四分戒本、戒坛普说法仪》所言。这部书前有两幅扉画，书后有莲华牌记：“此板于紫云洞，原本经律仪文一无增损，但其间字画差讹、语义重复者，今悉改正。杭州在城大街观桥南杨家经坊印行，时大明成化十一年岁次乙未七月吉新刊。”

4、笔者几年前在整理本馆收藏的原柏林寺本《碛砂藏》时，在残叶中还发现一部属于杨家经坊的佛教丛书残本。这件薄薄的经折装小册子两面印刷，上下皆残，已经看不出正背面。经册纸质较粗糙，字为楷体，其整体风格颇类上述《金刚经》。书高22厘米，一折宽8厘米，上下单边。全书刊佛经计有《大佛顶首楞严神咒》、《佛说解百家生冤结陀罗尼经》、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安乐行品第十四》、《佛顶尊胜陀罗尼》、《金刚经》、《般若无尽藏真言》等。在《般若无尽藏真言》后，有莲花牌记，刊“杭州众安桥北杨家印行”一行。从风格推断，其年代当在明代前期。

大概在明代中期以后，不再见到有关杨家经坊的记载，杨家经坊衰落了。笔者曾经在论文中对这种现象分析过，认为：“一个商业机构的存在与发展，应当离不开现时的社会需求与环境。”明代初期以后，环境变化，导致雕刻佛教大藏经和印刷装帧等一系

列活动发生改变，这是杨家经坊发展、衰落等变化的原因。分析杨家经坊与《磬砂藏》的关系，意义重大。